

翁同龢批校《南华经解》与《庄子》孙鑛批注探研*

冯 坤

内容摘要: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五年皖城藩署刻本《南华经解》,有翁同龢跋及批校。其中所过录明闵齐伋刊本孙鑛《庄子》批注,为我们理解孙鑛《庄子》批的流布和接受填补了中间环节。与他本对校,揭示了孙鑛《庄子》批的演变源流——先在明末的古文批点风气中被删改“提纯”为文艺性评论,又在晚清诸子学复兴的背景之下为高级知识分子所注意并试图弥补其中的大幅删削。处在“文艺化”与“经典化”两种时代风尚之间,孙鑛《庄子》批成为了时代思潮的典型缩影。

关键词:庄子 翁同龢 孙鑛 闵齐伋《南华经解》

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五年皖城藩署半亩园刻本《南华经解》三十三卷,扉页有翁同龢跋语,天头地脚有翁氏批校。此书《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翁同龢跋并录佚名批注”^①。今核翁氏所批实分三类:一类多眉批,作行草,过录自明闵齐伋刊本孙鑛《庄子》批注;一类为脚注,作楷体,乃翁氏以《古逸丛书》景宋本《南华真经注疏》校宣颖书之校记;其余偶有翁氏自注,作楷体细笔。翁氏参校之本,当时为日藏汉籍之新发现,今日已至为易得;翁氏细笔自注,亦多录自《经典释文》,如《逍遥游》“汤之问棘”上注“汤广大也;棘,狭小也”、《逍遥游》“犹时女也”上注“时女,犹处女也”,均自《释文》而来;其余翁氏观点散见于书中,既无统一标志,又乏体系,如翁氏于《天地》“自山林来”下注“‘来’字当属下,注非”、《外物》页五、六之间浮签评宣颖注“到训倒甚谬,‘静然’作‘静默’亦未然”等,整体上数量甚少,所论内容亦有争议。惟翁氏过录明闵齐伋本孙鑛批注,为我们理解《庄子》孙鑛批注的流布和接受填补了重要的环节。此书作为一个典型个案,在不同时代取舍殊异的注《庄》风格之间搭建起津梁。一方面它身处《庄子》孙鑛注的流传序列中,为我们揭示出孙注如何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6M600978)、国家图书馆科研项目(NLC-KY-2016-30)阶段性成果。

①《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650页。

在明末的多次删改中被“提纯”为专门针对《庄子》语言艺术的文艺性评论；另一方面在晚清诸子学复兴的背景之下，它又体现出晚清知识分子对《庄子》注的期待与通往这种期待的尝试，勾勒出他们所期待的《庄子》经典注解的模糊轮廓。处在“文艺化”与“经典化”两种时代风尚之间，《庄子》的注解也因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面向。我们不妨把此书看作一个小小的缩影，从中考察《庄子》注及其接受在时代思潮之下的转变。

一、《庄子》孙鑪注及闵齐伋刊本

孙鑪(1543—1613)，字文融，号月峰，一作越峰^①，又号湖上散人，浙江余姚人。遍注群书，间涉书画，批点经史子集诸书数十部，可参见明天益山堂刻本《孙月峰先生批评礼记》所附《月峰先生评书》目录。而翁同龢所录孙鑪批注，源于明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三子合刊》。闵齐伋(1580—?)，字寓五，又作遇五。乌程(今属浙江吴兴)人，以刻书为事，善刻套印批点本典籍及戏曲、小说，得一时风气之先。闵氏本合刻《老》、《庄》、《列》三子，均白文无注，《庄》、《列》眉批及字间套印孙注，不注批注者姓名^②。翁氏过录自明儒之本，亦不知为孙注，跋云“篋中有评点本，疑出吾乡明季老宿，大略偏于文字，而宗趣亦时有所会，遂写于此，以备览观”^③。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藏有孙鑪批注本《庄子》，封面题“孙月峰评点南华真经”^④，三书对照，可确定均为孙注。

上海辞书出版社藏孙批《庄子》，底本源出世德堂本《南华真经》，附郭象注及《经典释文》，书眉有朱墨批校。以《子藏》影印本观之，或似孙鑪手批，批语书写工整，时或接近版框，亦有不少删改符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此本为孙氏之清稿本，在誊写过程中进行了少许最后的删改。除此本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王澍刊本《孙月峰先生批点南华真经》亦与闵齐伋刊孙鑪《庄子》注存在重要联系。王刊本八卷，扉页作“孙月峰先生批点南华真经”，又刻“是书先出，嗣有《史记》、《汉书》、《左传》、《国策》，俱系先生批点，剗削未完，附此预白”，卷前有万历三十九年(1611)董应扬《批点南华经叙》及王澍小叙，王氏称“先是郑奉常崐巖先生与月峰先生为同乡，后交斯编藏郑氏久矣，董孝廉馆于郑而得之，不忍信货之独知也，遂授剗削”，其时孙氏犹在世，此本当为孙氏《庄子》批注较早的刊刻版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藏本当为存世各本之祖本，其内容最为丰富，批注之上所作的删改在其他刊本中也得以延续，如《人间世》“听止于符”上注“符字谓意想

①王孙荣：《孙月峰年谱》，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2页。王氏以为孙鑪早岁号越峰，又作樾峰，万历十二年丁母忧居月山七年，遂称月峰。

②国家图书馆藏《三子合刊》，明闵齐伋刻朱墨套印本。

③国家图书馆藏《南华经解》，清同治五年吴坤修皖城藩署刻本，见扉页翁同龢跋语。

④《子藏》影印本，见华东师范大学“子藏”编纂中心编：《子藏·庄子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49—50卷。

所及”中“字”被点去,《大宗师》“子舆有病”上注“此病状略同《人间世》篇支离疏语”中“篇”字为小字后补,此类删改共十馀处,皆为其他刊本所继承。而闵齐伋刊本与王澍刊本在底本的选择上一脉相承,均白文无注,亦无《释文》,仅附《庄子难字音义》^①。实际上,闵本与上海辞书出版社藏本之间的异文,大部分可以在王本中觅得来源,如《逍遥游》“以候敖者”上孙注“近用韵”,闵、王二本均作“通用韵”;《大宗师》“古之真人”上注“此段用三‘古之真人’句,后段用一‘古之真人’句,俱以是之谓真人收,然细看似无甚条理,亦只是任意填铺”,闵、王“用三”作“三用”,“似无”作“亦无”,“填铺”作“填补”;《知北游》“正获之间”上注“《大射》有‘司正’,获见《仪礼》”,孙氏稿本无此句,王本始有,并为闵本继承。底本改作白文本后,刊刻批注的空间随之缩小,故王本将一些批注移至字间,这种做法也为闵本所继承,这样的处理可能导致闵本失落一些批注,如《人间世》“师心”上注“师心即《齐物论》所谓‘随其成心而师之’”,王本作字间注,闵本即已脱漏。然而闵本并非完全承袭王本,而是以孙氏稿本或其他材料对王本加以校正,如《齐物论》“道枢”上注“……此点以明是收自知意,作反己观……”,“意作”二字王本讹作“急仁”,闵本仍同孙氏稿本;《人间世》“绝迹易”上孙注“精而有调”,王本无,闵本则有。此类王本脱去而闵本仍存的批注尚为数不少,如《骈拇》“乃至圣人”上注“故撰出许多字眼”亦是。与此相对,王本对孙氏稿本作出的增补,在闵本中亦往往删去,如《人间世》“寡不道”上王本注“做亦不可畏祸怕事来”,同篇“若与予也皆物也”上又有“故于三句之中四个‘也’字一个‘哉’字,此皆庄子之奇处”,二注孙氏稿本皆无,字体与前后不同,笔画不平直,更接近手写体,或为刻板既成后所补入,二注亦不见于闵本。那么闵本所作的校正源出何处呢?闵齐伋曾刊刻孙籛批注《春秋左传》,于《凡例》云:“大司马孙月峰先生研几索隐,句字不漏,其所指摘处,更无不透入渊微。家翁次兄为水部留都时,遂得手受于先生,不敢自秘,用以公之同好。”可见闵氏可能得见孙氏手稿,或许《三子合刊》亦在其列。

闵刻《三子合刊》对《庄子》孙籛注进行了大规模的删改。此书或直接著录为“《孙月峰三子评》”^②,或以为闵氏博采诸说兼下己意^③。但实际上与上海辞书出版社藏孙氏稿本及王澍刊本相比,将其视为孙籛注的删节本可能更为得宜。孙注稿本实为集注体,引林希逸、褚伯秀、罗勉道、陆西星、林疑独、刘辰翁等诸家

①王本所用底本及《庄子难字音义》,与吴勉学《二十子全书》本《庄子》相近,或承自吴刻。

与其他《庄子》版本相比,王、吴二本相当一致,王、吴二本与其他版本互校,其异文又不出世德堂本《南华真经》及林希逸《庄子庸斋口义》范围,或是以《口义》校世德堂本所得。闵本与王本之间则仅存在极少数孤立异文,如《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闵本作“溟”,“三食而反”,闵本作“殄”。闵本《庄子难字音义》散附各卷末,王本附于书后。

②如浙大藏本卡片作“《孙月峰三子评》十四卷”,见赵红娟:《闵齐伋的编刊活动、刊刻特点与影响及其刊本流布》,《文献》2014年第2期。

③方勇:《子藏·庄子书目提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

注,兼下己意。所引诸家之说,几乎尽为闵刻本所删。经笔者统计,闵本所删诸家引文共计105条,其中仅9条见于孙氏稿本而不见于王本,又有4条王本独有而孙氏稿本所无。除此之外,闵本所保留的孙氏引文中,又有数条隐去出处,它们分别出自林希逸、焦竑、方思善:《逍遥游》“天之苍苍”上“林云: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顿于此”,闵本删去“林云”;“汤之问棘”上“林云:以结语为起语”,闵本径作“以结语作起意”;《齐物论》“以隶相尊”上“林云:隶至下者也,和光同尘,而先其至下,是以隶为尊也”,闵删“林云”^①;《德充符》“外乎子之神”上“林云:收语作叹息意,甚有姿态”,闵删“林云”,“姿态”作“恣态”;“朝彻”上“林云:凡此数语谓道,是读书而后有得,做出许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归之造化”,闵删“林云”;《天地》“百年之木”上“方云:藕断丝连,似结非结”,闵删“方云”;《在宥》“故贵以身”上“贵爱身四句出老子。焦云:不轻以身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惜以身为天下者,天下反可托”,闵改作“贵身爱身四字出老子”。经过这番大规模的删改,保留下的孙氏引文只有3条:《养生主》“以有涯随无涯”上“赵文肃以‘随’作堕读,于理似较长,第音堕无据,或作轮回解犹为近”,《缮性》“缮性于俗学”上“焦《庄子翼》从张(闵无“张”字)君房本删去‘俗学’上‘俗’字”,《秋水》篇首“李性学云‘不读《秋水》篇,胸襟终不开阔’,细玩似未然。此篇犹是庄子皮肤语,第其议论痛快,笔势纵横发越,要自亘绝古今,所以人多喜之”。

闵本删去的引文,以疏通文意、训释字句为主。以《逍遥游》为例,所删的3处引文,“大有径庭”上“大有径庭是疆界远。罗云径门前路,庭堂外地”,“犹时女也”上“朱云:时犹‘孔子时其亡’之时”,“有蓬之心”上“林云:蓬心,犹茅塞其心也”,均释字句。而反观保留下的引文,其中近半关注布局谋篇与艺术造诣,只馀少数较为关键的字句校勘。与此相对的是,闵本在孙注之外,多出2条批注,如《天地》“伯成子高”上多“平淡”,《天运》“天有六极五常”上多“与上了不相蒙”。多出的批注,一条关注所注经文文学语言的平淡,另一条则关注所注经文与上文的文脉连接,它们也属于翁同龢跋语所云“偏于文字”的类型。总之,对于引文的改动是偏向以语言艺术为导向的。

由于引文已经对关键字句及概念进行了基本的疏解,引文之外的孙氏自注也就更多针对《庄子》的文字、文脉及语言艺术发论。仍以《逍遥游》为例,孙注特别关注行文中的布局谋篇与炼字炼句,篇中这方面的批注如“北冥有鱼”上注“千锤百炼,篇章字句无不妙,力劲而色浓,调谐而味永”,“徙于南冥”上“一事两叙。繁。看他何等节奏。换拍”,“鹏之背”上“‘背’字与‘翼’字相应”,“怒而飞”上“‘怒’字甚奇”,“天之苍苍”上“奥。又换拍”,“水之积”上“中忽插此一段议论,只发挥‘九万里’三字意”,“风之积也”上“撒开”,“蜩与”上“又插此一段议论,发明小不知大意,与后段‘小大之辨’句相应”,“汤之问棘”上“简”,“名为鹏”上“一详一略,小具变法。明”,“知效一官”上“至此则笔稍纵

^①王作“刘云”,林希逸《庄子口义》亦无此语。

矣,然纵而不失其严”,“宋荣子”上“以下更隋鍊”,“巢于深林”上“华语点缀妙”,“樽俎而代之”上“冷语收有味”,“归休乎君”上“倒句”,“吸风饮露”上“错落好”,“以天下为事”上“亦有章法”,“聚族而谋”上“此处尚未尽炼法”,“虑以为大樽”上“《荀子》多有此虑字法”,“以候敖者”上“近用韵”,这类批注尽数为闵本所保留。而与此相对,孙鑛自注为闵本所删者共计50条,《逍遥游》中共删5条,其中4条疏解《庄子》原文,1条考辨文字,与该篇中大量保存的艺术性评论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我们也看到,孙氏对语言艺术的评论也有不少同被删去,二者大致各占其半。闵氏所删的艺术性评论大多简短,这或许与孙、闵所用《庄子》底本不同有关。孙注《庄子》底本源出世德堂本,附郭象注及《经典释文》;闵刻则承自王本为白文本,仅于卷后附《庄子难字音义》。这导致闵本正文篇幅远小于孙批底本,难以容纳大量批注。实际上在王本中,许多批注已经从书眉移至行间,闵本亦是如此。许多简短的艺术性评论亦为闵本所删,可能也由于这方面的因素。不过总体来说,经过了闵氏的大规模删汰,闵刻孙鑛《庄子》批注仍然更多地专注于《庄子》的艺术特色,同时也削弱了孙注对字词与文义的疏解,与其朱墨套印的物质载体形式可谓相得益彰。

二、翁同龢过录本对闵齐伋本的删改

翁同龢所录孙鑛注,出自闵齐伋刊本。翁氏眉批所录均可见于闵本,而与闵本相比又经过了相当程度的删削。批注中出现异文,往往孙、闵二本相同,改动与讹误出在翁本;或是闵本产生异文,为翁本所继承。如《知北游》“圣人固贵一”上注“此又阐明一番,在摘辞家亦是法,第谈理贵有含蓄,若发挥太彻,反觉气薄”,闵本分后句在“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上,作“法家谈理贵有含蓄,若发挥太彻,反觉气薄”,翁与闵同,仅“谈理”作“说理”。又如《寓言》“非吾罪也”上注“《人间世》‘古之有也,非吾有也’句法同”,闵作“句法同,意亦同”,翁作“句法用意亦同”,明显承自闵本。翁本与孙鑛手批偶有重合,这种情况一般为闵本出现明显讹误,翁本以意改之,故与孙批偶合,如《秋水》“遥而不闷”上注“独‘遥’‘撮’二字系生造出,所以费解”,闵本“费”作“废”,翁、孙作“费”;《天下》“惠施多方”上注“惠施只是辨于道无当”,“惠施”孙本作“惠子”,闵误作“惠字”,翁改作“惠施”,可见翁氏所改出于己意,而非据孙批其他版本校正。

翁氏本过录孙注,与闵本对校,又删去批注近百条。与闵本删削的取向相似,前文所述关于布局谋篇、炼字炼句的评论大多得以保留。翁本一方面进一步压缩闵本残存的疏通文义的内容,另一方面也除去许多简短而容易重复的文艺性评论,如“节奏好”“隋”“鍊”“净”等,在孙批中不止一次出现,大多也被删去。删削之后的孙注呈现出更为纯粹的文艺性面貌,这类删改共计96条。

翁同龢跋语称其过录的批注来自“篋中有评点本,疑出吾乡明季老宿”,那么这些删削是出自翁氏之手,还是录自该明末评点本呢?翁氏批注中留下了一些细微的线索,如《天运》经文“建之以太清”下有三十五字衍文,为成玄英疏

误入, 闵本注“自‘夫至乐者’起至‘太和万物’止, 原系注疏中语误入正文”, 翁本不录此语, 翁氏以《古逸丛书》景宋本《南华真经注疏》校勘时亦不知其为衍文, 出校记云“‘太清’下宋本有‘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 顺之以天理, 行之以五德, 应之以自然, 然后调理四时, 太和万物’共三十五字, 此脱失”, 由此或许可以推测翁氏未见闵本, 而明儒过录本删去了文字校勘的内容, 翁氏便另据宋本校勘, 而对孙注的处理并无回应。此类例子亦可见于《缮性》、《则阳》二篇。《缮性》“缮性于俗, 俗学以求复其初”, 孙、闵皆注“焦《庄子翼》从张(闵无“张”字)君房本删去‘俗学’上‘俗’字”, 翁又于其下出校“宋本重一‘俗’字”。《则阳》“文武殊材”下翁校“宋本无‘殊材’二字”, 而孙本无“殊材”, 注“‘文武’下疑阙二字”, 闵同, 可见翁氏与闵、孙的取舍亦不相同。

这个明人过录本在翁注中也留下了自己的校勘痕迹。宣颖本《齐物论》经文“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 而待彼也邪”后接“化声之相待, 若其不相待, 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 所以穷年也”, 继之以“何谓和之以天倪? ……忘年忘义, 振于无竟”, 其中“化声”与“何谓”两部分本或互乙。翁氏于“化声”下以录文字体过录“一本‘化声起’至‘穷年也’五句在‘忘年忘义’上”, 又于“何谓和之以天倪”下以校注字体注: “宋本‘何谓和之以天倪’句接‘而待彼也邪’句下, 与‘一本’正同”, 可见前注云“一本”者并非翁校, 闵本亦无此语, 当从明人过录之本来。

《庄子》注解对语言艺术的关注始自宋代, 林希逸、刘辰翁等诸家注在这方面都有所用心。而以评点时文的方式读《庄》, 可以说是明代流行的趣味。闵齐伋刊刻孙鑛批注, 不仅对批注加以删削, 而且在底本的取舍上也表现出对文义疏通和字句训释的忽视; 翁同龢所过录明本对孙注的文艺性“提纯”, 比之闵本可谓更进一步。孙鑛批注由于本身蕴含较多文学评论的因素, 实际上常常以这类“艺术性提纯”的方式存在于明清各类《庄子》集注集评中, 作为诸多注解中“文艺性”的点缀。而孙鑛本人所注重的对前人注解的吸收, 以及在文义疏通、字句训释与艺术性评论之间的平衡, 却并未被后人接受。我们可在其他例证中观察到这一现象的不断重复。

三、其他明清《庄子》集注集评对闵刊孙鑛注的选择与删汰

明清《庄子》集注集评所引孙鑛批注, 亦多源自闵齐伋刊本。这意味着孙鑛注产生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建立在闵刊本的基础之上, 它所得到的理解和接受也需要从闵刊本的特色出发来衡量。孙鑛注对明清《庄子》集注集评的影响, 我们可从后文中的例子来考察。

明钱塘卢氏溪香馆刻《三经晋注》或许是个典型的例子。此书合刻《周易》、《老子》、《庄子》, 附王弼、郭象注, 书眉刊刻诸家批注^①, 其中孙注径作“孙鑛曰”。

^① 见国家图书馆藏钱陆燦批点本《庄子南华真经》, 其底本为《三经晋注》本《庄子》, 其说见《子藏·庄子书目提要》, 第10页。

我们仍以《逍遥游》为例,上文所见批注已被删削大半,幅度甚至超过翁同龢过录明本,仅保留“孙鑪曰一事两叙”“孙鑪曰怒字甚奇”等少量文艺评论。此本所引孙注亦出闵本,二本的关键异文保持一致,如前文所述闵本保留孙鑪引文而隐去出处,《三经晋注》本亦同,其余引文则亦均删去。不过,此本亦有极个别异文超出闵本范围,如《天地》“子贡南游于楚”上孙注“佳事妙旨”,王、闵本作“凡事妙旨”,此本作“机事如旨”(翁本作“凡事妙方”);又如《天运》“立于四虚之道”上此本有注“孙鑪曰有境色”,孙、王、闵皆无。对比闵刊本,《三经晋注》对孙鑪注进行了几乎可以说最大程度的删削,使其几乎仅表现《庄子》的艺术特色,在书眉诸家批注中成了文艺性评论的代表。在此之外,国家图书馆藏钱陆燦批点《三经晋注》本《庄子》,甚至还需要批点者根据闵刊本补入一定内容,如《逍遥游》篇中钱氏于“惠子谓大瓠”上手批“孙月峰以下两段俱是明大材不可小用意”,《人间世》篇“悦生而恶死”上批“以答上阴阳之患”、“托不得已以养中”上批“以上答人道之患,月峰分解亦妙”,又于《列御寇》“郑人缓”上批“孙曰此儒墨皆非真,止是干禄之具……”。上述几条批注均疏解文意,《人间世》两条亦是以《庄》解《庄》,四注均不见于底本《三经晋注》,而皆见于闵本。钱氏亦尝批注闵刊本,手迹今藏上海图书馆,上述数注,极有可能反从闵本补入。

清人王闿运辑评《百大家批注庄子南华真经》^①中的孙鑪注也与《三经晋注》非常接近。仅有少数几条选取不一致,如《大宗师》“三日而后能外天下”之“参七九是修炼家语”,《三经晋注》本无,而此本有。二者的异文也表现出趋同特性,如《德充符》“肝胆楚越”上“此等语初出时甚奇,在今时则所谓了不异人意”,二本“初出”后均无“时”字;《应帝王》“肩吾见狂接舆”上“此下三节俱论治天下之道,大略相同,俱主在无为,然意浅,文亦不甚工”,二本均仅录至“意浅”,且“意”后有“似”字;《胠篋》“将为胠篋”上“议论较前两篇更痛快”,二本均无“议论”之“议”。二者在孙鑪注流传的版本系统中关系非常紧密,孙鑪注在这些集注本中所起的作用也颇为相似。

翁同龢过录孙鑪《庄子》注以补宣颖《南华经解》,但翁氏或许并未注意,他意图补充的宣颖解实际上已经消化吸收过孙鑪批注,只是作为清初儒士,宣颖的宗旨与明末读《庄》者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离。宣颖解中对孙鑪注有所称引,这无形中形成了对孙注的拣选与删汰。宣颖颇有内容与孙注相合,尤其是《说剑》篇末辨此篇为伪作,注“孙月峰曰:是战国策士游谈,与《弋说》及《幸臣论》相似,然气格视彼二篇更浅”(闵本作“事与辞俱非庄派,只是战国时策士游谈,正与《弋说》及《幸臣论》相似,然气格视彼二篇更为浅薄”)。《让王》篇末亦辨伪,注“孙月峰曰:此篇诸段多与《吕氏春秋》同,夫吕书虽有袭《庄》、《列》者,然不应此篇独袭之多,子瞻谓此下四篇皆伪作,诚然”(闵本作“中诸段多与《吕氏春秋》同,夫吕氏书虽有袭《庄》、《列》者,然不应于此篇独袭之多,且气格

^①《子藏》影印本,见《子藏·庄子卷》,第124卷。

浅弱,亦与庄文不类,苏子瞻谓此下四篇皆非庄子作,或者近是”)。宣氏进一步发展孙氏所引的苏轼《庄子祠堂记》之说,不仅判断《让王》等四篇为伪,而且径将其移置全书最末。除此之外,宣颖解中与孙注相合处,均可见于闵本,然而去取标准与闵本所秉持的风尚已经大相径庭。宣氏所引孙注,如《逍遥游》“瞿鹊子问于长梧子”上“庄子学于子夏,所称夫子多系孔子也”(闵本作“庄子之学本于子夏,凡所称夫子多系孔子”),《大宗师》“禹强”上“北方之神,即真武也”(闵本作“禹强似即今真武神”),《大宗师》“三日而后能外天下”上“三七九是内修家语,偶用之”(闵本作“参七九是修炼家语”),《应帝王》“全然有生矣”上“‘全然’《列子》作‘灰然’,对上文‘湿灰复然’甚好”(闵本作“‘全然’《列子》作‘灰然’”)。如此近20处相合,大部分均如上文所引训释字句,仅有两处关注语言艺术,一在《天下》,作“详列诸家,每段先用数语劈空引起,下乃举其人以实之,盖特作峭逸之笔也”(闵本作“此下正是指道术之裂。凿空撰数语起,下乃举其人实之,真是奇肆,大醒人心目”),另一在《让王》“共伯得乎共首”上注“两语收有馀韵”(闵本作“两浓语收,有不尽之味”)。颇为遗憾的是,宣颖引孙注,意在疏通文句与训诂考证,所引却无一超出闵刊本的范围。这意味着闵氏删去的孙籛自注及孙籛引文宣颖可能未及得见,这无疑局限了宣颖所能参考的材料范围。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孙籛《庄子》批注所产生的影响,大多来自闵齐伋本《三子合刊》,而闵刊本对孙籛注的塑造和删改,一方面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引领了孙籛《庄子》注“纯文学”化的风潮,一方面又制约了后来者对孙籛注的解读和利用。这种修饰不仅使孙注失去了较为均衡的面貌,闵刊本产生的一些异文或多或少也影响了后人对孙注的认识。对照上海辞书出版社藏孙批《庄子》,一些注文可以得到更合适的理解,如《德充符》“申屠嘉”上注“造语绝练净,然意不甚深,笔气浅妙颇似《列子》”,“浅”孙作“清”;《骈拇》篇名上“此下二篇俱是快文,第太发越少蕴藉……”,“二”孙作“三”;《缮性》“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上“亦是大同小异之论”,“大同小异”孙作“大同小康”;《庚桑楚》“天乎人乎”上“人心之天犹曰赋生,而况以天理饰人欲耶”,“赋”孙作“贼”。又如孙籛解郭象注及《经典释文》等语,在闵本中依旧保留,却因为闵本更换底本而变得不可索解。这也是闵齐伋刊本带来的另一种影响。

四、“乱世读庄”——晚清知识分子的《庄子》学与《庄子》的经典化

翁同龢读《庄子》,受同乡旧友书法家杨沂孙影响颇深。翁氏所校之《南华经解》即得自杨氏,其书扉页有翁自题“同治癸酉三月沂孙寄赠”及杨氏题“叔平侍郎惠览”。《翁同龢日记》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1873年)三月三十日亦记“得杨咏春函并新刊《庄子注》”,注“宣颖撰”^①,或即此书也。翁氏所藏《南华经

^①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第三卷,第1008页。

解》扉页另有二跋，一称“此杨君濠叟所赠，君晚年得力于此，而余白首无闻，愧负良友。松禅记”，一称“余童时读《庄》，但喜其文字而已，中年以后，乃弃置不读。今老矣，稍稍探其宗趣，亦颇知周末文敝，不得已而为是激昂之论也。篋中有评点本……以备览观。庚寅七月十二日同龢记”。翁氏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五月廿四日（公历7月10日）至七月十二日（8月27日）间颇记“看《庄子》”，共12条之多，并有贪看《庄子》“不免废事”“废弃一切”之精神^①。可见翁氏始读此书在获赠17年后，其已为六十老翁，其友杨沂孙亦于光绪七年（1881年）辞世，故有“老矣”“白首”之叹，并觉“愧负良友”。然而在长期弃置之后，翁氏重新读《庄》，并非仅仅出于年届花甲对生老病死、世事无常的感慨，甚至或许与之相反，是出于对某种新潮动向的嗅探。在甲午之前的变局中，以新视角重新审视传统学术已经开始萌发成长为学术的新风尚，诸子之学一时大盛。在此之前，姚莹《东溟文集·罪言》及《康輶纪行》分别推重老庄及管子之书；魏源《老子本义》亦称“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之书也”。宗稷辰《再书庄子后》亦以“救世”期待加诸老庄：“得力于《老》者，可以理已平之天下，使之息争；得力于《庄》者，可以理将乱之天下，使之弭釁……后世有救时之责者，其慎毋局局于王道之畦畛而薄《老》、《庄》为无用也……。”^②相比之下，强调实务的曾国藩则更加平实地称道诸子可资治道之处：“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③以《庄子》相赠的杨沂孙，自身亦是读子风气的践行者。除《庄子》之外，杨氏遍注诸子，与翁氏共题元刻明修本《纂图互注荀子》，今藏清华大学图书馆；又批校光绪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本《老子》、《管子》、《墨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前四书及所辑《吕氏春秋录要》均藏南京图书馆，《淮南子》及所辑《管子今编》藏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又藏其所批校乾隆五十三年庄逵吉刻本《淮南子》及同治九年刻姚鼐《老子章义》。翁氏中年长为帝师，对年长17岁的杨氏“得力于此”的诸子学并未表示出深刻的理解。然而到了1890年的夏天，在救世的期待下，当时的诸子学已经进一步发展为针砭时弊的立言工具，这是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潮流，也正合乎翁氏所谓“周末文敝，不得已而为是激昂之论”。

正是在1890年，汤震《危言》得以出版，此书观点大致以西方政教出自《周礼》而技术出自诸子，以这种改头换面的方式为新学新法寻求合法性。此后暴得声名的廖平、康有为，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来利用传统学术。廖平著有《庄子经说叙意》及《庄子天下篇新解》，又手批清林云铭《庄子独见》，康有为亦题明焦竑《庄子翼》，更晚的此类著作还有王树相《庄子大同说》及佚名著《庄子大同

①《翁同龢日记》，第五卷，第2414—2426页。

②徐世昌等编，沈芝盈、梁运华点校：《清儒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卷二百三，第7902—7903页。

③《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

学》。诸子学的批判性在舆论中同样激起了反向思考,叶德辉便担忧“吾恐异日必更有以战国诸子之学攘西汉者矣”^①,张之洞也怀疑“光绪以来,学人尤喜治周秦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学诸君子所及料者”^②。一方面,诸子学或许充当了变革者寻求“性与天道”的历史资源;而另一方面,由于诸子书多取材于周秦方术,其学术背景与知识构成又开拓了清儒的视野,天然可以作为沟通传统学术与西方新学的途径。事实上,经学与诸子本是中国传统思想不可分割的两面,边缘化的诸子学对正统儒学来说一向扮演着“补充”与“异端”的双重角色,故而在时运变换的时段中,如果经学不能完全适应传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局面,那么诸子典籍就会更多地得到学者与名士的重视。

然而在巨大变革之前的1890年,翁同龢的思想仅在守旧与趋新之间开始微妙的摇摆。翁氏曾经接触过汤震《危言》^③,也与康有为等人有过私下的交流,至于早有往来的洋务派郭嵩焘更是精通《庄子》,其侄郭庆藩著《庄子集释》即多引其说^④。翁氏此时并不需要革命性的“庄子大同说”,面对着“周末文敝”之下“激昂之论”的潮流,他或许亦未明确地寻求到理论上连接新旧之学的切入点。然而循着清代传统学术的路径,讨论诸子义理总是需要文献学作为基础,这或许也是诸多晚清名士留下诸子典籍注疏、批校、题跋的缘故。治诸子学与经学不同,诸子典籍在历史上缺乏与经书相似的严格校勘与完整注疏。仍以《庄子》为例,虽然在诸子中地位较高,不乏郭象注、《经典释文》、成玄英疏等经典注疏,其《释文》在宋代亦与诸经同得官方校勘,然而却从未出现注、疏、《释文》三者合刻的版本。治《庄》者校勘《庄子》常常径改原字,与经书的校勘方式亦不完全一致。在注疏校勘并不完备的情况下,为了理解《庄子》,翁同龢进行了大量的相关阅读,关注的典籍包括综合艺术评论与考证校勘的宣颖《南华经解》,又抄录屡经删削而偏重艺术性的孙鑛《庄子》注,同时利用新出的《古逸丛书》景宋本《南华真经注疏》及所附成玄英疏进行校勘并出校勘记,又批校传忠书局本《庄子》。上述典籍的构成或许出于翁氏的主动选择,但也不排除受翁氏交游视野与阅读习惯的影响与限定。无论有意无意,翁氏对于《庄子》相关材料的阅读与使用,体现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之间的平衡。不过这种新时代的学术期待终究并非是即将卷入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的翁氏所能够实现的目标。郭庆藩《庄子集释》与王先谦《庄子集解》在翁氏之后面世,学理上也更加精审,翁氏批注《南华经解》只是学术与时代的诉求的一种体现。

【作者简介】冯坤,女,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先秦思想史。

①《与戴宜翘校官书》,《叶德辉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7页。

②《劝学篇》卷上内篇,清光绪二十四年中江书院刻本。

③见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④同上书,第29页。